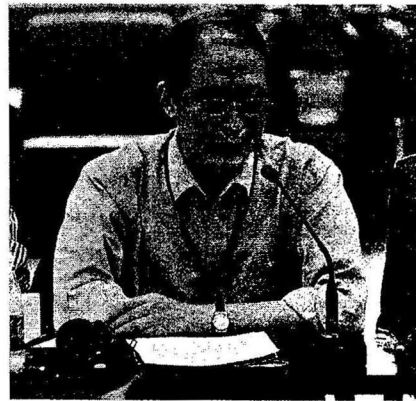


《跨文化对话》：十年中欧知识界思考对话的平台

钱林森

十二年前,即1996年4月,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曾承办过一次题为“对话:文化的差异与共存”(Culture: Diversité et coexistence dans le dialogue Chine-Occident)的中欧跨文化对话论坛,这是由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教授和乐黛云教授牵头,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合作,继1991年3月中山大学“文化的双向认识策略”、1993年6月北京大学“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之后的第三次国际跨文化学术会议,我很荣幸受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委托,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外文系赵宪章和许钧教授支持下,与法国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出版与交流部主任苏盖(M. Michel Sauquet)先生联手主持了那次盛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外学者就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和双语出版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畅想,共提出了30余种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其中乐黛云教授提出的《远近丛书》和我本人提出的创办一份《跨文化对话》杂志的设想,得到了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的赞同和支持。苏盖先生曾幽默地称1996年的南京会议是一次“梦想的会议”。追随“南京的梦想”,中欧(中法)合作伙伴,随之在北京大学和巴黎维拉苏(Villarceaux)古堡进行了数次磋商,达成了包括创办《跨文化对话》丛刊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



钱林森教授

经中法双方两年多积极筹备,《跨文化对话》中文版创刊号终于于1998年10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并于当年当月在上海举行隆重的首发式,正式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南京的梦想”也随之成为现实。迄今为止,《跨文化对话》已出版23期。而今,这份以寻求平等对话、促进文化多元共存发展为宗旨的国际同人论丛,已迈过了十年旅程,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中外学界,特别是中欧知识界思想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对话》论丛正是中欧第三次相遇、对话应运而生的产物,它的生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文化合作背景和坚实的学术思想基础。

《跨文化对话》创刊号首先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讨论”专号而面世,发表了本刊中方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汤一介的《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本刊外方学术委员、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著名生物学家当尚(Antoine Danchin)的《由生物学论及伦理道德的几个问题》,本刊外方学术委员、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哲学家艾柯(Umberto Eco)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以及介绍中欧跨文化平等对话的标志性人物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文字。同时还以显著地位刊发了本刊法方主编、人类学家阿兰·李比雄(Alain le Pichon)和法国思想家、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关于“更新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重估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认识”的对话,本刊外方学术委员、法国和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艾克沙维·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与汤一介教授关于“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的对话,本刊中方主编乐黛云教授和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huwarez)关于“历史与记忆——20世纪人类的教训”的对话,创刊号以中欧诸多名家的专论和对话,响亮登场,开创了中西方知识精英对话的平台和基调。

自此,《跨文化对话》编辑部和中方主创人员,便在日常组稿和实际编务中,努力寻求跨文化对话话语,利用各种机缘与西方学者交流对话,并以此作为我们编辑《跨文化对话》的中心方针。于是,“前沿碰撞”、“圆桌会议”、“海外专递”、“专论”、“多声道”、“学者对话”,或“学人访谈”,便发展为《对话》论丛的传统栏目,名副其实的成为中外学者集体思考对话的论坛。如《对话》第2辑开发的由中国知名学者李慎之、张世英、汤一介、乐黛云和美国华人学者成中英以及德国、荷兰学者参加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圆桌会议”和“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的“多声道”栏目;第3辑“前沿碰撞”栏目刊发了中方主编乐黛云和海外学者金耀基“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元”的对话、我本人和法国华裔学者程抱一的“东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愈合”的访谈。《对话》第4辑开设“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圆

桌会议专栏,发表哲学家德里达的《世纪与宽恕》、艾柯的《寻求沟通的语言》海外专论。第5辑发表“科学与人文”、“关于普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圆桌笔谈和海外知识精英熊秉明“艺术、哲学、宗教及其他”的对谈,以及思想家弗朗索瓦·于连的“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专论,等等,不一而足。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跨文化对话》绝非封闭的经院知识精英论坛,而是在前沿思考、实践的思想家、知识分子所共享的学术场所和交流的园地,它与东西方知识界共同关注的文化热点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因此,2001年4月出版的《对话》第6辑,在开设“科学与人文”、“关于普世伦理”的专栏和知识精英圆桌笔谈,及介绍“他者”的哲学家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文字和汉学家程艾兰对话的同时,还以“海外专递”的显著位置,刊发了本刊时任巴黎联络处主任、现任副主编的金丝燕教授之长篇报导《巴西国际社会论坛会议随记》,首次向国人披露了人类进步基金会处于一线思考和实践的思想和实践家所推崇的“公民社会”论坛信息,本辑卷首语一开头就这样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新世纪第一春,我们有幸为大家首次独家报道一个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在巴西波尔图-阿莱阁召开的、与瑞士沃达斯世界经济论坛遥遥相对的巴西国际社会论坛。后者有掌握着世界政治命脉的顶级企业家和各国政要云集,前者则是规模空前的世界人民大会。这次人民大会是一次‘公民社会’理想的实践,除来自117个国家的4700名正式代表外,还有12000名非正式代表参加。每天上午有10个大型讲座,下午是400个小组讨论会!这里人们畅所欲言,还可以直接和沃达斯论坛的人物进行对话,开创了普通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反宰制的新记录。详情请看亲身参加者生动活泼的《巴西国际社会论坛会议随记》。”《对话》第8辑,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基金会为建立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行动纲领,同时刊登了哲学家德里达“解构与全球化”南大讲演录;法兰西院士、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的“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思想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关于“极权与霸权”的思考。编者卷首语开宗明义,向中国读者推介:“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大潮迅猛发展的新世纪之初,人类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式的古老问题,便又重新提到了世人的面前,要人们思考、抉择、行动。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焦虑的深入思考,一个由不同区域的地理文化团体、不同领域的专业社群和不同肤色的知识者代表组成的‘全球协力尽责多元联盟’认为,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人类应当展开一场精神的、道德的、知性的和制度上的广泛革命’。为此,他们提出了‘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世界’的行动纲领,并将在巴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

的支持下,召开世界公民大会,汇聚世人的才智和力量,将他们的思考和理想,付诸实践。与此相应和的,法国解构主义大师、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先生于2001年9月上旬,风尘仆仆来到中国,将他对于当今世界的新思考带来与中国学者交流。”接着,《对话》第9辑,以“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世界”为题,开设“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专辑,刊发了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的《选择和平,拒绝战争》、金丝燕访谈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和与会的中国作家张炜的《责任、理性和浪漫》、于硕博士《寻找人类——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随笔》等文,使《对话》的中国读者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人类进步基金会所彰显的人类和平相处、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理想和追求。《对话》第12辑,为“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专辑,刊发了皮埃尔·卡蓝默的《十年合作的回顾和展望》和《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长篇报道等文。

从第17辑起,《跨文化对话》锐意进行版面改革,以扩充容量,拓展与处于一线思考的西方思想家交流对话的深度和广度。17辑为“中法文化年专号”,除设立与中法文化相交汇的杰出人物如德里达、弗朗索瓦·程、弗朗索瓦·于连的专辑,以及法兰西两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让·皮埃尔·雷米和思想家克里斯特娃等文化精英的文章和对话外,还特设“海外专递”的栏目,以醒目的位置登载了基金会卡蓝默和苏盖关于网络和教育改革的专文,编者在卷头语也特别提到:“本集‘海外专递’两文作者卡蓝默和苏盖先生,是当代法国知识界一直处于前沿思考和致力于实践的代表,他们对国际网络和巴黎名牌大学改革的奏议,正与本刊第13辑‘大学改革论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议论相呼应,反映了中法知识界心气相通,中外文化血脉相连的一面,理应得到读者关注。”

《跨文化对话》第18辑,设“社会协同治理”和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两个专辑,发表了西尔万·拉维勒的《协同治理的精神、技术、伦理和民主》、阿勒菲雷多·裴纳-维加的《知识协同治理的展望》、陈力川的《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与实践》、埃德加·莫兰的《教育的七个黑洞》和高宣扬的《莫兰对现代知识的反思》等文章,主编特向中国读者举荐:“人类社会面临众多严峻挑战:强权、暴力、战争成了人类难以摆脱的梦魇;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期盼,对理性最终战胜狂热和偏激的信念始终未曾泯灭,‘社会协同治理’的思想就是要探讨如何应对暗潮汹涌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如何将涉及全人类的科技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如何疗救曾被疯狂掠夺的大自然;如何淡化各种争端,以应付共同的挑战,特别是建立一个有效预防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将‘不可调和’的冲突化为可谈判解决的分歧。社会协同治理的思想对我国正在创建的和谐社会无疑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话》第19辑是“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的专论,发表了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的《21世纪的大学》、陈力川的《欧洲的大学沿革——兼论大学的使命》、高宣扬的《莫兰教育思想简论》,以及莫斯科大学校长B. A. 萨多夫尼奇、圣彼得堡大学校长JL. A. 韦尔毕茨卡娅和我国学者参与讨论的文章。编者不仅将我旅法学者陈力川对大学精神的深邃思考名句、高宣扬对思想家莫兰教育思想的精辟阐释文字刊载在封底,提请读者注意,而且也在卷头语中进一步阐明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的重要意义,与基金会卡蓝默和中法才俊们进行了同步思考和深度对话:“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是当今消弭人类危机,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因为管理明天世界的代表正是从今天的大学中产生。本期进一步介绍了莫兰的教育思想。莫兰认为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思想方法的改革,即树立复杂性思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整体的改造。因为知识间相互割裂的不断加剧和各地区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和隔离状态使人们难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面临的重大危机。卡蓝默的文章进一步提出:大学的首要职责不是教育学生如何适应未来社会——好像历史提前写好了一样,而是培养学生进入世界和创造世界,处理各种关系和进行必要变革的能力。陈力川进而论证大学的无条件性就是质疑一切的权利,包括质疑问题本身的价值和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地发问,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罗岗的文章则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重新解读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深入讨论了‘大学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其他各篇有关当前大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也都各显精彩。”

《对话》第20辑是“中俄文化年专号”,同时刊发了“美国主义研究”专栏和艾柯的《圣战,激情与理智——关于文化优越性的遐思》专论,以及21辑“中国—瑞典”文化专号、22辑“海内外儒学研究专号”诸多对话和文章,直至23辑“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专号”,既有法国和美国的知识精英托多罗夫、列奥·斯特劳斯的访谈和专栏,更有外方学术委员、著名生物学家当尚和金丝燕教授与卡蓝默主席、本刊主编乐黛云教授那密切关注时事、鲜活深刻的跨文化对话和专论,处处显示出《跨文化对话》所构筑的对话平台,是中外学者所共享的、平等的论坛,是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是自由开放的论坛。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跨文化对话》自创刊起,它的中国同人就和法国和欧洲知识精英、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巴黎人类进步基金会等处于一线思考、实践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紧密合作,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社会文化热点话题,诸如多元文化共处、伦理与未来社会、协力尽责多元世界、社会治理、教育和社会

持续性发展等话题,开设专栏,展开自由的交流探讨;我们始终坚持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始终恪守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原则,历十年之久,而使《对话》论丛成为中外(中欧)知识界、文化界集体思考、自由交流的思想论坛,它的生成和发展,生动地折射出十年中欧知识界精神交流和思想对话的历史侧影,并以独特的思想风貌而载入十年中欧对话的历史史册。

《跨文化对话》的十年历程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的思考和经验,这对我们在中西(中欧)第三次相遇中的对话,也将是有益的启示。

2008年9月20日,初稿;2008年10月5日,修订于南京龙江秦淮河西